

屈賦新探

湯 炳 正



齊 魯 書 社

屈 赋 新 探

汤 炳 正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96753



齐 鲁 书 社

一九八四年·济南

996753



一九八二年端阳作者
留影于屈原故乡秭归

前言

抗战时期，我开始爱上了屈赋。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，促使我跟屈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共鸣。

在贵阳时，就曾以《楚辞》教诸生于上庠，偶有心得，辄笔而存之。虽未敢以著述自期，但却积下不少的资料与零稿。

建国后，五十年代，为了熟悉新事物，学习新理论，工作繁忙，没有整理旧稿的机会。六十年代初，才开始写《〈屈原列传〉理惑》、《〈楚辞〉成书之探索》等篇。发表之后，受到学术界的多方鼓励，殊增惭悚！但十年浩劫，不仅打乱了写作计划，就连旧日的各种书籍与杂稿，也几乎全部散失。而我个人则已年近古稀，并卧病不起者五年之久。

动乱结束，收拾烬餘。关于建国前的屈赋残稿，只剩下《〈招魂〉“些”字的来源》一篇；建国后的屈赋残稿，除已发表的两篇外，只剩下《草“宪”发微》一篇。餘则断章零句，无从清理，仅仅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理解，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已。

然而，我在万象更新、病体渐有起色的情况下，为祖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添砖加瓦的思想，实在按捺不住。乃带病奋笔，把自己对屈赋的旧心得或新看法，有选择地加以整理，成文二十篇，辑为此书。

为了便于读者，本书编纂，以类相从。即：第一组，主要

谈屈原的生平事迹；第二组，主要谈《楚辞》的成书与传本；第三组，主要谈屈原的思想与流派；第四组，主要谈屈赋里的神话传说；第五组，主要谈屈赋的语言艺术。总之，都是些探索性的结论，很不成熟。出版的目的是以此就正于学术界。

在出版的准备工作中，我院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的领导曾给予大力支持；至于抄写校勘，则皆由研究生李大明同学任其劳。在此并致谢意！

汤炳正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四川师院

DC27/11
目 录

《屈原列传》理惑·····	1
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·····	23
“左徒”与“登徒”·····	48
《九章》时地管见·····	58
《楚辞》成书之探索·····	85
释“温蠖”	
——兼论先秦汉初屈赋传本中两个不同的	
体系·····	110
关于《九章》后四篇真伪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	124
论《史记》屈、贾合传·····	139
草“宪”发微·····	176
“先功”及其他·····	208
试论《天问》所反映的周、楚民族的两次斗争·····	222
民德·计极·天命观·····	238
从屈赋看古代神话的演化·····	250
《天问》“顾菟在腹”别解·····	261
曾侯乙墓的棺画与《招魂》中的“土伯”·····	271

神话、历史与经今古文学·····281

屈赋修辞举隅·····292

《招魂》“些”字的来源·····370

屈赋语言的旋律美·····386

《楚辞韵读》读后感·····407

后 记

《屈原列传》理惑

（一）今本《屈原列传》存在的问题

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，本来是研究屈原生平事迹最主要的资料，也是现存的较早和较系统的资料。如果以《楚世家》、《新序》、《国策》等互相参证，则屈原生平事迹，不难秩然得其条贯。

但今本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却存在不少问题，致使屈原事迹前后矛盾，首尾错乱。总括前人所举者，例如：屈子赋《骚》，既叙于怀王疏原之时，又叙于襄王既立之后，则《离骚》之作，究在怀王之世，抑在襄王之时？此其一；又上文既曰“（怀）王怒而疏屈平”，“屈平既绌”，“屈平既疏，不复在位”，而下文又曰“虽放流，睠顾楚国，系心怀王”，则怀王之世，屈原究竟是被“疏”，抑或已被“放流”？此其二；“虽放流，睠顾楚国，系心怀王”到“王之不明，岂足福哉”一大段评论赋《骚》的文字之后，忽接“令尹子兰闻之大怒”，则子兰之怒，究竟是怒屈子赋《骚》，抑是怒屈子之“既嫉”子兰？如果是怒屈子之“既嫉”子兰，则何以中间忽然插入一段评论赋《骚》之语，致文意扞格不通？此其三；又上文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”到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一大段，寻其内容与语气，实与下文“虽放流”以下“其

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……”一大段紧密相承，皆对屈子赋《骚》所作之评语，但中间何以又插入“屈平既绌”到“屈平既嫉之”历叙数十年来秦楚兴兵的一大段，致前后互不相蒙？此其四；全传行文，何以屈原、屈平，交互错出，称谓混乱？此其五；……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，则对屈原生平事迹就无法理出一条可靠的线索，从而对屈原平生的政治活动、文学创作、思想发展等，也就无从得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。

正因为今本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存在很多问题，故历代研究《屈原列传》的人，曾不断进行探索，企图得一合理的结论。但见仁见智，聚讼纷纭，结论各有不同。其从文学角度而为之说者，对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”到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与“虽放流”到“岂足福哉”这两大段文字的插入，或谓此乃史迁的变体，或谓此乃史迁奇玮之妙笔，或谓此乃夹叙夹议的龙门笔法。但“变体”也好，“奇玮”也好，“夹叙夹议”也好，而从行文之规律言之，则首先要求其“通”，如果章节段落之间前无所承，后无所受，首尾横决，文理龃龉，则史迁之文必不至弩劣乃尔。清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曾引于慎行《读史漫录》云：“世之好奇者，求其故而不得，则以为文章之妙，变化不测。何其迂乎？”近姜亮夫同志虽极力推崇史迁《屈原列传》中这两大段文字是“以苍茫郁勃之气，发为倜傥自恣之文，不能悉以文章规矩相绳”，但又谓“此盖古人文法未甚缜密之处”，“此固不容阿讳”（见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）。总之，从文学角度来看，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

其次，从历史角度而加以探讨者，则亦有各种不同的结论。例如屈原之作《离骚》，本在怀王时代被疏之时，亦即壮

年时期。自汉以来，除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外，如刘向的《新序·节士》、班固的《离骚赞序》、王逸的《离骚经章句序》以下，都是如此，而近古以至现代的屈原研究者，则多根据今本《屈原列传》中“顷襄王立”以下“虽放流”一大段评《骚》文字，并佐以其它论据，谓屈原赋《骚》乃在顷襄王时，亦即晚年时期。如王闿运的《楚辞释》、游国恩同志的《楚辞概论》、《屈原》，郭沫若同志的《屈原研究》，都作如此主张。但亦有感到此说之不安，而游移于以上二说之间者。如姜亮夫同志的《屈原赋校注》、刘永济同志的《笺屈余义》等，皆谓《离骚》之作，当始于怀王之世，成于襄王之时。盖由于今本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既叙屈原赋《骚》于怀王之世，又评屈原赋《骚》于襄王既立之后，故欲以此调和这个不可否认的矛盾。总之，从历史角度探讨《屈原列传》者，始终还没有作出较为稳妥精确的结论。

尤其应当注意的是，清末的廖平，在他的《楚辞新解》里，认为《屈原列传》全篇文义不贯，前后事实矛盾，竟以此为根据，断定屈原并无其人。而这个结论，后来却被胡适所利用，在他的《读楚辞》里，借口屈传的矛盾，否定屈原的存在，说什么屈原是后人凭空捏造出来的“箭垛式”的人物，从而在中国历史上把屈原这位伟大诗人一笔抹掉。

不难看出，由于今本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存在很多矛盾，给屈原研究者带来不少困难和问题，致使屈原生平事迹之真象，无由大白于后世，是不可以不辨。

（二）今本《屈原列传》之被窜乱及 原本《屈原列传》的本来面目

考今本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中由“国风好色而不淫”到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一段，在班固的《离骚序》中引用时，说它是淮南王刘安《离骚传》之语。盖刘安的《离骚传》班氏犹及见之，故加引用，其言信而有征，历代对此并无异义。但是，这里却有两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：即对《屈原列传》里的刘安这一段话，人们始终认为是史迁自己采入《屈原列传》的，而并没有意识到它是被后人窜入的。其次，今本《屈原列传》中属于刘安《离骚传》的话，是止于上述的那一段，抑或还有其它部分，人们至今还没有明确地识辨出来。因而对屈原事迹的考证，纠葛百出，缠绕不清。如果能将以上两个问题理清，还原史迁《屈原列传》的本来面目，则屈原的生平事迹和创作活动，自然会条贯分明，了如指掌，前人之所纷然聚讼者，亦不难迎刃而解。

今按，史迁当时并未见过刘安的《离骚传》，今本《屈原列传》中所引刘语，乃后人所窜入者。因为史迁的《史记》和刘安的《离骚传》都写成于汉武帝之时；刘安《离骚传》之写成，虽略早于《史记》，而史迁实未得见。所以，史迁在《史记·淮南王列传》中，只云：“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，不喜弋猎狗马驰骋。亦欲以行阴德，拊循百姓，流誉天下。时时怨望厉王死，时欲叛逆，未有因也。”而关于淮南王所著书与辞赋，则一字未及。至班固撰《汉书》时，《淮南王传》全袭《史记》，唯于“流名誉”句下，始增补下列一段：“招致宾客

方术之士数千人，作内书二十一篇，外书甚众。又有中篇八卷，言神仙黄白之术，亦二十余万言。时武帝方好艺文，以安属为诸父，辩博善为文辞，甚尊重之。每为报书及赐，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。初安入朝，献所作内篇，新出，上爱秘之。使为《离骚传》，旦受诏，日食时上。”（重点号都是笔者加的。下同）高诱《淮南子叙目》亦云：“初，安为辩达，善属文。皇帝为从父，数上书，召见，孝文皇帝甚重之，诏使为《离骚赋》，自旦受诏，日早食已。上爱而秘之。天下方术之士，多往归焉。”（高诱的这段话，跟《汉书》大致相同，但有两个错误：第一，“孝文皇帝甚重之”，“文”字显系“武”字之误。“皇帝为从父”句，因既误“武”为“文”，故世系关系不得不改。实则孝文帝时，刘安年尚幼小，所谓招致宾客著书立说等一切活动，都跟他的年龄不相适应，故应以《汉书》为是。第二，《离骚赋》也显系《离骚传》之误。荀悦《汉纪》的《孝武皇帝纪》，虽“武”字未误，而“传”亦误“赋”。此盖因《汉书》中“使为《离骚传》”之下，又叙刘安献“赋颂”，故与《离骚传》相涉而误。《汉纪》全以《汉书》为据，而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曾谓：《汉纪》“间或首尾不备，其小有不同，皆以班书为长”。误《离骚传》为《离骚赋》，当即其中之一例。荀、高都是东汉末年人，而荀悦的错误，影响较大。说详下段。）考史迁书例，凡前人著述，或叙其书目篇卷，或录其作品原文，或具体，或概括，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。而著述宏富如刘安者，竟在《史记·淮南王列传》中一字未提，这决不是偶然的。因为刘安的《离骚传》等，史迁并未见过。

有的同志认为《史记·淮南王列传》：刘安谋反时，胶西王臣端议曰：“淮南王安，废法行邪，怀诈伪心，……臣端所

见，其书、节、印、图，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，甚大逆无道，当伏其法。”这其中的“书、节、印、图”的“书”，即指淮南王所著诸书。但我认为这样理解“书”字，是不确的。因为这里的“书”跟“节”、“印”、“图”四者并举，事实上皆指刘安谋反时的“物证”而言。而且紧接上文，皆有所承。所谓“书”，是指刘安听伍被计所伪造的文书等，亦即上文所说：“伪为丞相御史请书，徙郡国豪杰任侠。……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逮书，以逮诸侯太子幸臣。”所谓“节”、“印”，是指刘安谋反时所伪造的“节”与“印”等，亦即上文所说：“王乃令官奴入宫，作皇帝玺，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，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，汉使节，法冠。”所谓“图”，是指刘安谋反时所绘用的军事地图等，亦即上文所说：“王日夜与伍被、左吴按舆地图，部署兵所从入。”因此，下文胶西王举出“书、节、印、图”，为“大逆无道，当伏其法”的罪证。如果其中的“书”是指的《淮南鸿烈》、《离骚传》等，则武帝当时如此喜爱的书，怎能据此以构成“伏法”的罪状？故从《史记·淮南王列传》中，实难找到史迁曾见过《离骚传》等书的痕迹。

至于史迁当时之所以未见淮南王所著书及《离骚传》等，盖当时这些书，虽已献之武帝，而未宣布于世。故史迁并未得见，当然更无从著录于本传，更无从采入《屈原列传》。淮南王书当时之所以未布于世，推其原因，盖不外其始武帝“爱秘”之，故未予宣布。所谓“爱秘”，当谓置之手边，秘不示人，或置于刘向《七略》所谓“秘室之府”；并不是付之“太常、太史、博士之藏”，供史官披阅。继因淮南王以谋反被诛，故又不便宣布。汉代因谋反而不传其书者，史有事例。如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云：“世所传百两篇者，出东莱张霸。……以中书校之，

非是。霸辞受父，父有弟子尉氏樊并。时大中大夫平当，侍御史周敞，劝上存之。后樊并谋反，乃黜其书。”可见，由于刘安谋反被诛，其书未得宣布流传，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史迁即使见过刘书，亦不便广为征引传播，况因上述种种原因，史迁并未得见。迨元成之世，刘向校书中秘，始得淮南王书而叙录之。（见高诱《淮南子》序）而《离骚传》亦当同时出现。故班固撰《汉书》，始得据所见以补《史记·淮南王列传》之缺。因此，史迁既未见过刘安的《离骚传》，则今本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中所引用的《离骚传》，并非原本《史记》所固有，乃后人窜乱之文；而且由于窜乱者学识卑劣，以致前后矛盾，文理不通，历代学人，咸受其累。

其次，刘安《离骚传》语之被窜入《屈原列传》者，其实并不止于班固所引用的那一段。就今本《屈原列传》而言，由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……”到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，由“虽放流，……”到“岂足福哉”这两段文字，都是后人割取《离骚传》语窜入本传者。要确定这个问题，首先不能不对未被割裂的《离骚传》的原型作一番探讨。

根据班固的《汉书·淮南王传》和《离骚序》，都说刘安作《离骚传》；只有荀悦、高诱等，才说是作《离骚赋》。其实班固的说法，具有最高权威。因为他不仅在《淮南王传》里述及刘安作《离骚传》的事实，而且他确实也读过《离骚传》的原文，并在他的《离骚序》里加以引用和评价。（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里，有时称之为“传”，有时称之为“赋”，盖因刘安书已佚，故只得根据不同的记载而为之说。）刘勰在《辨骚》里引用《离骚传》的一段话，全系从班固的《离骚序》里转抄而来，并没有见过原文。因此其中对字句的省略和剪裁，与

《离骚序》完全一致。而王念孙竟认为《汉书·淮南王传》中《离骚传》的“传”字当系“傅”字之误，“傅”乃“赋”之同音借字，刘安所作乃《离骚赋》，非《离骚传》。（见《读书杂志》）王氏此说实大误。因为据班固《离骚序》中所云，刘安所作的《离骚传》，既有总叙，又有注文，并不是“赋”。他说：刘安以为“五子以失家巷，谓五子胥也。及至少康、贰姚、有娥佚女，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，然犹未得其正也”，这就是指的《离骚传》中的注文而言。所以王逸在《离骚经章句序》中又称它为“淮南王安所作《离骚经章句》”。颜师古《汉书》注说《离骚传》犹如《毛诗传》之类，这说法是对的。但《离骚传》又有一个总叙，班固序引用“国风好色而不淫”一段，说是“淮南王安叙《离骚传》”的话，也就是指这个总叙而言。今本《屈原列传》中所窜入的，也就是《离骚传》的总叙部分。由此可见，刘安的《离骚传》跟后来班固、王逸之注《离骚》其体制是相同的，即注文之外，又有总叙。

现在，我们如果把被后人窜入《屈原列传》中的两大段文字联系起来（当然中间难免有所删节），更可以发现刘安、班固、王逸三家的总叙，虽论点不尽相同，而其结构层次基本上是一致的。这也许是班、王袭用了刘氏旧例的原因。例如：

（1）解释《离骚》的命名：

离骚者，犹离忧也。……（刘）

离，犹遭也。骚，忧也。……（班）

离，别也。骚，愁也。……（王）

（2）阐述《离骚》的内容：

上称帝嚳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武，……（刘）

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，下言羿浇桀纣之失，……

（班）

上述唐虞三后之制，下序桀纣羿浇之败，……（王）

（3）说明赋《骚》的意图及怀王不听忠谏的结果：

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。然终无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，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……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。（刘）

以讽怀王，终不觉悟，信反间之说，西朝于秦。秦人拘之，客死不还。（班）

冀君觉悟，反于正道而还己也。……拘留不遣，卒客死于秦。（王）

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，未被割裂的刘安的《离骚传》，其结构层次，与班固的《离骚序》、王逸的《离骚经章句序》大同小异。因此，今本《屈原列传》中被后人窜入的《离骚传》的话，不仅班固所引用的“国风好色而不淫，……争光可也”这一段，而是从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”直到“争光可也”这一大段。这是刘安《离骚传》的前半部。其次，从以上的比较中更可以看出，今本《屈原列传》中由“虽放流”到“岂足福哉”这一大段，也是后人窜入的《离骚传》语。这是刘安《离骚传》的后半部。前半后半不仅文笔风格完全一致，而且结构层次也脉络相通。两段合起来，犹可以看到接近完整的《离骚传》的梗概。

既然把后人窜入部分由《屈原列传》中剔除出去，则原本《屈原列传》的真面目即呈现出来。即史迁原本《屈原列传》，大体与刘向《新序·节士》篇相近。虽详略互见，而梗概略同。其“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”之下，跟《节士》篇一样，紧接着就是秦使张仪至楚献地，迫楚绝齐。盖屈原既绌，张仪之计始

得行，叙笔极为严密。这中间并没有今本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”到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一大段文字。在怀王客死于秦，长子顷襄王立，“屈平既嫉之”之下，也跟《节士》篇一样，紧接着就是襄王听信谗言，放逐屈原。这中间也没有今本“虽放流”到“岂足福哉”一大段文字。《节士》篇的资料，其价值仅次于《屈原列传》，虽不能说他与史迁所根据者同出一源，但同为先秦古传之仅存者，则可断言。故其基本梗概是互相吻合的。

后人何以要窜入这两段文字？从前一段看，盖企图接在屈原赋《骚》之后，对《离骚》的内容作一番阐述与评价。这一段的窜入，除了史实与评语互相杂厕，文意扞格以外，倒没有别的大问题。至于第二段的窜入，盖企图说明怀王国败身亡为天下笑，是由于不纳屈原忠谏的结果。但这一段却窜错了地方。如果是窜在怀王“竟死于秦而归葬”之下，虽文理扞格，尚不大乖于史实。而不谓竟窜于“长子顷襄王立”和“屈平既嫉之”之下，遂致文理扞格，史实淆乱，造成千古疑案。除本文第一节所举者外，又如日本泷川龟太郎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于屈传“终不悟也”一段下引日本学者中井积德曰：“怀王既入秦而不归，则虽悟无益也。乃言‘冀一悟’何也？”可见此段疑案，不仅古今同感，亦中外一致。

（三）屈原研究中疑难问题的解决

由于揭示了今本《屈原列传》被后人窜乱的事实，恢复了原本《屈原列传》的本来面目，于是在屈原研究中一向聚讼纷纭的疑难问题，也就不难予以合理的解决。

第一、关于屈原赋《骚》的年代问题。这是由今本《屈原